

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与政治环境的互动

——潮人学校转型的观察

李志贤

(新加坡国立大学)

摘 要: 现存由潮人社团始创或资助的学校, 大多经历了两次明显而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从潮人学校转型为深受中国政治因素影响的华侨学校, 而在二战后由华侨学校逐渐融入当地的教育体系, 最终转型为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新加坡潮人社团兴学的历程, 表明了新加坡潮人社团的教育事业与中国、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加坡潮人社团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相应调整其教育事业以更恢宏的姿态主动纳入历史的潮流, 融入国家社会的建设行列, 去巩固其传统的地位和加强其现代的价值。

关键词: 新加坡; 潮人社团; 潮人学校; 教育; 政治; 互动

中图分类号: G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225(2004)03-0063-008

潮人最早涉足新加坡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据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所载, 潮侨先贤余有进(1805—1883)于1823年(清道光三年)从汕头来新加坡, 书中还叙述了他的身世和他来到这个英国殖民地后所参与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区活动。^{[1](P19-22)}这是至今有关潮人最早到新加坡谋生, 有史可查的文字记载。据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的人口统计资料, 到了1881年, 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总共已约有86,800人, 其中潮籍移民便有22,650人左右, 占华人人口之26.1%。^[2]

早期南来谋生的潮人, 多为从事劳力工作的单身汉, 既疲于生计, 又因文化水平较低, 根本无暇于文化与教育活动。至19世纪末, 新加坡的商业经济已日渐发展, 社会日益进步, 随着移居新加坡的潮籍家庭的激增, 潮人社群迅速壮大, 且在商业经营上崭露头角。潮人本有重视儿女教育的优良传统, 商务贸易来往又极需广泛的知识和文字的应用, 这就促使潮人社群开始关注后裔在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许多潮人设法让子女向有文化的长辈亲友或邻里学习, 有些当学徒的年轻人则在夜间利用工作之余向店主或师傅学习, 都是以口述相授的方法, 并无教材可言。只有家境较好的家长, 才有能力将子女送到私塾, 或雇请老师到家中, 教导子女读书识字, 学习写信和契据, 以及简单的记帐方法, 其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能够与家乡亲人通信, 应付谋生经商之需。所以, 早期新加坡潮人的“学校”多是社团、宗祠、庙宇附设的蒙馆或富商所开设的私塾。到了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后, 海外华侨受到国内维新思潮的影响, 才陆续在侨居地集资创办学堂, 培养华裔子弟。就在此种外在因素的推动之下, 新加坡潮人在当时海外各籍华侨兴学的热潮中, 也开始积极从事创办学校的教育事业。

追溯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由潮人社团始创或资助的学校, 大多经历了两次明显而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从潮人学校转型为深受中国政治因素影响的华侨学校, 而在二战后由华侨学校逐渐融入当地的教育体系, 最终转型为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本文旨在通过历史的脉络, 探讨新加坡潮人社团兴学的历程, 从潮人学校在性质上所经历的重大转型, 分析新加坡潮人社团的教育事业与中国、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观察新加坡潮人社团如何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其教育事业方面以更恢宏的姿态主动纳入历史的潮流, 融入国家社会的建设行列, 去巩固其传统的地位和加强其现代的价值。

收稿日期: 2003-12-12

作者简介: 李志贤(1957—), 男, 新加坡人, 祖籍广东澄海,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 端蒙与义安——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的标志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陈云秋、廖正兴、杨庄缙等 20 人发起捐资创办了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当时清廷两广总督还派刘士骥南来视学，商谈办校事宜。^① 端蒙学堂之开办是新加坡潮人自创学校的先声，其意义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此，新加坡潮人之教育事业逐渐建立，逐步推广。

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也是促使当时新加坡潮人办学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英殖民地政府对新加坡教育所关注的只在于培养极少数当地人充当文官，对华文教育则采取不闻不问的放任政策。^{[3]（P8）}有鉴于此，和其他方言帮派一样，潮人基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子弟而出资办校。至二战后初期，由于受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所限制，许多政府学校都不能录取超龄的学生，潮人社团因此开始创办更多的学校，目的在于招收因战乱失学或超龄的子弟。

有些学者认为潮人办学另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是潮帮本身的权力斗争。例如蔡子庸等人为挑战余有进家族的领导地位而创办端蒙学校，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件的起因是蔡子庸等人不满余氏家族长期控制义安公司和主导潮人社会，企图创办一新社团来与余家对抗，并期望取代余家成为潮籍侨领的地位。在 20 世纪初期，要成为社群的领袖，除了参与公共文化和宗教慈善活动之外，对自己社群的教育贡献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蔡子庸等人便是要藉创办端蒙学校以控制潮人社群的教育文化事业，以期获得社群的更大认同。^②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加坡潮人已先后创办或资助多所学校，计有建国幼稚园、擎青、树人、菁莪、培英、培道、植哲、醒华、陶蒙、陶英、辅女、洛英、文选、华农、广德、潮阳、粹英、椰林、中国公校、义安等十多所幼稚园、中小学，以至大专学府。^{[4]（P23-56; P97; P217-219; p55-59; 913）}其中除了私人办学外，由社团主办或赞助的学校，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由信托机构如万世顺公司和义安公司所主办资助；由宗教性的慈善组织如善堂所主办或资助；由传统的社团如潮阳会馆、揭阳桂林刘氏公会等所主办或资助。其中，义安公司在这方面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见表 1）。这些潮人社团所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均具相当规模，无论在行政或教学上，都有严密的组织和系统；而在 1940 年建立的义安女校和 1963 年创办的义安学院，更是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的里程碑。前者为当时潮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主办的唯一女校，它的创立显示了当时新加坡潮人已经超越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重男轻女的腐朽观念，而展现了一种以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和高瞻远瞩的务实精神去培育下一代；后者则是当时潮人在海外创建的唯一高等学府，建校宗旨与理想在于培养科技与商科人才，以应社会经济发展之需求。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潮帮创立义安学院，和当时其领袖连瀛洲对闽帮主导南洋大学有所不满的帮派竞争有一定的关系，^{[5]（P62-65; P17-22; P178）}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义安学院的成立与发展，却足以说明新加坡潮人办学的目标是与时俱进的，是以国家社会发展为整体考量的。义安学院在今天已经扩展成为新加坡一间规模盛大的理工科大专学府，多年来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和企业人才，对当地社会经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关端蒙学堂和义安女校、义安学院的历史，记载颇多，本文不予赘述。^{[6]（P248-249; P81-92）}值得一提的是，潮人先贤在办学时体现了有教无类和推己及人的传统美德，他们不仅资助本籍贫寒学生的学费，对于其他方言群的子弟也一视同仁，无分畛域；而在长期办学的过程中，尽管出现过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总的来说，潮籍领袖、社团和学校三者间的互动，无疑也加强了潮人社群的团结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表 1 新加坡潮属社团主办/资助之学校 71（P244-250; P96-112）

成立年份	学校	主办/资助之社团	备 注
1906	端蒙学堂（1906）	万世顺公司（主办）	1953 年 6 月义安公司接管端蒙校政；1957 年接受政府全部津贴； 1995 年停办。
	端蒙分校（1924）	义安公司（由主办转变为资助）	
	端蒙中学（1955）		

① 林国璋《本校大事记》称当时两广总督为张人骏，见王韶生主编《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31。
② 以蔡子庸、廖正兴、陈云秋为代表的一批新贵，透过不同的方式挑战余氏家族。其中如创办端蒙学校便是藉以控制潮籍社群的教育文化事业。这具体表现在学校的理事会成员上，如蔡子庸被选为主席，廖正兴与陈云秋被选为副主席；后者还被选为该校第一任校长。另外，他们也积极参与潮籍社群以外的社团和活动，如中华总商会的会务。这都是争取更大社群认可的社会地位。可是因为余氏家族在义安公司的地位十分牢固，它也掌握大部分公共文化与宗教活动，故要等到林义顺等人的崛起，义安公司才得以易手。详见颜清煌《新马华人社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176。Yen Ching-hwang,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930 见郑良树主编《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 710-712。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30年代①	广德学校	义安公司（资助）②	1976年停办
1940	义安女校	义安公司（由主办转变为资助）	1956年接受政府全部津贴；1967年男女合校；1981年改名义安小学。
二战前	桂林学校	揭阳桂林刘氏公会（主办）	二战后改华农学校
1946	南安学校	南安善堂（主办）	1975年停办
1946	同敬学校	同敬善堂诚善社（主办）	1981年停办
1953	朝阳学校	潮阳会馆 （由主办转变为资助，直至1982年改为特别学校为止）	1956年接受政府全部津贴；1982年1月1日改为朝阳特别学校。
1963	义安学院	义安公司 （由主办转变为资助）	在1967年《义安学院法案》下，义安学院改为公立学院，每年由义安公司拨款资助；1968年易名义安工艺学院，现名为义安理工学院。 关于义安公司在端蒙中学关闭后，公司另建新校而不沿用“端蒙”校名之事，按义安公司的说法，是因为公司已成立义安小学及义安理工学院，如果再拥有义安中学，就会有三全其美之意思。参阅《联合早报》，1993年3月16日，第13版。
1994	义安中学	义安公司（资助）	
不详	大陆：皖济中学 蓬洲小学	新加坡蓬洲同乡公会	

二 与中国政治环境的互动：从潮人学校转型为华侨学校

潮人社团初办学校的宗旨只是为当地的潮侨子弟提供教育，并藉以加强他们对潮人社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这些学校的建校基金和办学经费都由潮侨或潮人社团捐献和补助，校务决策权也由他们掌握，学校多建在潮人的聚居地区，收生自然以潮人子弟为主，就连教职员也以潮人居多（见表2）。在教学上，除英文一科之外，其他科目也都以潮语为媒介，充分体现了潮人学校的特色。端蒙学堂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8]另一个例子是规模较小、校址建在巴爷里（Paya Lebar）葱茅园下芭潮州人聚居地的华农学校。由于地缘关系，其学生多是当地居民的子女，所采用的教科书以古书为主，并聘请随潮州乡亲移居新加坡的一些有学问的“老先生”任教。学校内的教学和沟通媒介语以潮州方言为主，这种现象，在二战前后还很普遍。^{[9]（P13）}

当时，由于历史因素使然，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局势，潮人教育的兴起也因此深受中国政治局势波动的影响，这可从清廷与民国政府不断派官员前来东南亚视察窥见一斑（见表3、4）。19世后期，积弱已久的清廷欲以教育救国而大力提倡开设中西学堂。清廷在中国大力推动新式教育的同时，

① 有关广德学校的成立年代和其创办人之一林尚，出现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根据林尚的口述，学校约成立于1920年末至30年代初。当年林氏曾通过林雨岩向义安公司要求土地建校以及津贴。义安公司答应捐出原已租给赵裘之地，租户赵裘也同意。参考《林尚录音访谈》，口述历史馆，1987年3月24日，卷3；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Lim Sioh and Mdm Teo Cheng Imm, 19 June 1987, Reel 4. 第二种说法是学校设立于1939年。参阅许魁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页179；唐青《新加坡华文教育》页65；第三种说法是学校在二次大战结束初期成立。参阅靳浩《潮人学校》。笔者采用许氏与唐氏的说法，也就是学校成立于1939年，理由是这两位学者所采用的资料进行调查的时间比较接近学校的成立年代。反之，林氏的口述历史是在80年代末才编集，距离建校已有一段时间。又因为在接受访谈时，林氏年事已高，无法确定该校成立于何年。口述历史馆曾与林尚做过几次的访谈，其中涉及广德学校的内容出现了前后矛盾的说法。在录音带卷3中，林氏说广德学校成立于日本人未入侵新加坡的二三年前；而在录音带卷4，则表示学校成立于1920年末或1930年初期。再者，依当时学校所在的财后村的人口人数来分析，在1920年代整个村才有几户人家，直到日军南侵的前夕，人口突然增至30多户。战争爆发后，人口更增至160余家。广德既以潮籍社群为收生对象，在1920年代，由于没有学生来源，自然没有急于在当时办学的需要。只有在1930年代末因为居民人口越来越多，子弟入学的需求因此而增加。故而笔者认为学校是于1930年代末设立的说法可信度较高。假设林尚当年曾经向义安公司的林雨岩要求捐地一事属实，那应该是在战后的事情了，因为林雨岩也只在1947至1948年间担任义安公司的司理之职，而开始对广德学校提供津贴也应该在这一期间。由此推论，林氏是因为在战后基于要复校之缘故，才向义安公司要求捐地和津贴以重新建校。

② 广德学校当时在义安公司所捐出的一块土地上建校，并曾获得义安公司司理林雨岩答应对学校津贴60大元。参阅靳浩《潮人学校》；黄叔麟《财后村怀古》，见林孝胜、林源福编《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联合出版，1987，页92；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Lim Sioh and Mdm Teo Cheng Imm, Reel 4；Irene Lim Ai Lin, Chye Kay Vill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e Soon Community, Singapore: The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of Nee Soon Constituency, National Archive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1987, pp. 231.

也派遣官员前来新加坡劝学，这一来，为新加坡潮人社群的教育起了一定的催生作用。从表 3 可见，除了端蒙学堂筹办期间，两广总督派刘士骥前来视学，与学堂发起人共同磋商办学事宜之外，无论是奉朝廷之命专程前来视察的官员，或是路经新加坡的清廷大臣，多到作为潮人学校代表的端蒙学堂参观，并以捐赠物品、金钱、匾额，或演讲等方式，进行访问宣慰，其目的是要鼓起潮人办学的热忱，也是为了要拉拢当地的民心。两广总督张人俊还会上奏朝廷曰：

查该绅商侨居南洋各埠，不忘祖国，奋志兴学，捐助经费，实属深明大义，自应优予给奖，以示鼓励……拟请奖给同知职衔并赏花翎……花翎道街蔡名英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花翎道街廖世芳捐端蒙学堂一千两，花翎知府陈积锦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花翎同知街蓝镇平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沈联芳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吴锦源捐端蒙学堂一千两……查捐助地方善举银至千元以上者准建坊……给予急公兴学字样，以昭鼓舞。[11]

从奏折可知，清廷还以卖官、封爵等手段来拢络奖励捐资教育者，当初捐资端蒙学堂者都获得清廷颁发的奖励官衔，甚至可以建立专坊。这种可以令捐资者光宗耀祖的途径，自然对他们存有巨大的吸引力，清廷藉此赢得捐资教育者对朝廷的认同。1908 年端蒙学校就曾与新加坡各学堂联名为光绪帝祝寿。[12]（P205）

表 3 清廷与新加坡潮人学校的互动[13]（P94—102；P157—160）

年/月份	事 项
1906	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刘士骥前来视学，并与端蒙学堂创办人磋商办校事宜。
1907. 3	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汪大燮任满归国，途经新加坡，参观端蒙学堂，赠“果行育德”匾额并捐大洋五百元。
1907. 3	宣慰华侨钦差大臣杨士琦在参观端蒙学堂之余，捐助教育品一百六十余元。

端蒙学堂的设立与发展亦受清末维新派的影响。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南洋，在其劝导与鼓吹下，不少维新派人士不但在华校任教，有些还成为新式学校的创办人或教职员。如端蒙学堂创办人之一和首任校长陈云秋便是维新派成员。[14]（P6）在教职员方面，端蒙学堂的 11 位教师中，8 位为维新派或同情维新派人士。① 而这些教职员都是在学堂成立初期所聘请的教师，由此可见端蒙学堂是维新派人士所掌控的学校之一。

端蒙学堂也同样受到了革命派的影响。据颜清煌所述，革命派与维新派为了争夺学校控制权，曾在学堂发生冲突。事因当年该校校长何子深受革命派人影响，大力宣传革命思想，除了公开分发鼓吹革命的出版物，还鼓励学生参与书报社与其他革命派的活动，这引起了担任副校长的维新派人袁寿民的不满，起而引发争端。后来当何氏带一些学生回中国深造时，竟然为校方董事会所解聘。② 端蒙学堂由维新派人士所掌控，是不难理解的事实。试想当时创办学堂的人士主要都是商人，当然是倾向支持对本身事业能带来稳定作用的维新派思潮，而不愿意看到革命或倾覆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动乱，这是商人办学的一个特点。

为何这三股政治力量会如此热衷在海外鼓吹兴学办校呢？对于清廷来说，它想通过学校号召海外侨民支持他们以消灭颠覆分子，而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则认识到，要想在华人社会内维持长久的影响力，势非控制现有的社团机构不可。所以，学校乃是他们欲达到政治目的之必要途径，因为学校不仅具有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关键地位，而且也可提供工作机会给维新派或革命派人士。不仅如此，学校也是从事政治活动最佳的掩护场所。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政府承继清廷余绪，与海外华教单位保持联系。民国政府也不时派员到新加坡去视察及调

表 2 端蒙学校教职员籍贯（1906—1916）[10]（P180—182）

籍 贯	人 数	百 分 比
潮州	39	60.9%
潮安	20	
揭阳	13	
澄海	2	
饶平	2	
潮阳	1	
惠来	1	
其他籍贯	8	12.5%
广州	3	
大埔	1	
山东	1	
浙江	1	
福建	1	
厦门	1	
籍贯不详	15	23.5%
非华族	2	3.1%
总 计	64	100%

① 此 8 位维新派或倾向维新派的教师为马乃堂、陈锡桐、王雨若、杨淡吾、袁寿民、杨次衡、李牧甫、翁少珊。见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页 185。

② 据颜清煌与端蒙学堂校友蔡辉生所作的访谈记录。见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 189。

查华文教育，潮人社团的教育仍然与中国维系着紧密的关系。1914年6月，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胡维贤到端蒙学校监考，并致词。1919年4月，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到端蒙学校演讲，并与教职员讨论相关教育问题。^①1920年12月，蔡元培曾在前往欧洲航程中停靠新加坡并出席由端蒙、道南、南洋华侨和启发等四间学校联合举办的欢迎会。1940年3月，新加坡代总领事李仁出席义安女校的开幕典礼，并致词。^{[15] (P3 P86; P98)}

教育与民族意识的增强不无关系。如果说，教育是民族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那么，学校则可以说是民族意识发展的重要场所。民国甫立，政府官员便不时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前来参观学校，参与活动，这与清初政府最初把海外华人视为“弃民”，后来才把海外华人视为天朝子民的态度，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也漠不关心，反而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海外华人教育表示支持。这些位居要津的官员们莅临学校，使得当时地处祖国之外的潮人侨领感受到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当时的新加坡潮人社会主要是由下层移民所构成，这种情感上的强烈感受，犹如重归祖国的怀抱，随后升华为对中国产生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由郁达夫撰写的义安女校校歌，便充分地反映了潮人社团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而跳动这一事实：

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们是民族的精英。我们想改造社会，先要把自己的脚跟立定；刻苦耐劳，意志坚定；礼义廉耻，是五千年来的好教训。大家向前进，养成我们独立的精神，先要把国家的需要认得清。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女主人。^{[16] (P99)}

在端蒙学校的校务报告里，也充满着这种爱国情绪：

中华民国现在是一个多难之秋，民族精力表现萎缩和衰败。我们为祖国而办教育，对于培植爱国情操一点，亦值得留意。我们是爱人类，但因爱人类而更爱中国，故此我们训育的理想，不要违背了爱的教育的主旨。^{[17] (P27)}

这股强烈的民族意识，显然很快便超越各方言群的族群意识。各帮所办的学校开始脱离了自身族群的藩篱，不自觉地进入一个整合和转型的过程。端蒙学校开始参与其他帮派学校的活动，并在1914年与属广东帮的养正，属福建帮的道南、爱同，属客帮的应新，以及崇正等校组成跨帮派的“英领华侨学务总会”。^{[18] (P17)}端蒙和各校之间的这种跨帮派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它分别在1922年和1935年参加了当地华侨为欢迎英国太子所筹办的提灯会和庆祝英皇登基银禧纪念大会^②；1930年，端蒙学校的教职员还曾组织了交流团，到其他各帮派的中小学参观，从这参观交流活动可以看出当时不同方言群的华校之间已经打破隔膜，彼此是中国人（华侨）的认同已不断强大起来。^{[9] (P4)}

1930年代，适逢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故在民族情感的发酵之下，潮人学校也和其它华校一样，参与对中国的筹募救亡或救灾运动。例如端蒙学校的教职员在1932年和1937年都参与了新加坡华侨向中国助赈的筹募活动，义安女校也在1940年学校初设之始献金38.47元，同年2月师生月捐24.6元，又捐出妇女节售游艺券所得246.2元，又代售星华筹赈大会主办的书画联合展览会券。在1940年和1941年的儿童节也分别有献金的活动。^{[19] (P99)}

这种普遍上认同于中国的民族意识和信念自然也表现在教育的内容和性质上，透过学制和课程的编排、教材的和媒介语的采用反映出来。诚如岑春煊向清廷奏报新加坡的学堂“课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20] (P35)}，端蒙学校的学制在创办之初期，即实施1906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分成两等。及1912年，又遵循民国政府新颁布的“壬子学制”，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为制。自1924年起，学制则“依照本国现行学制小学修业年限”，即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学制，将高小三年班改为初中一年级。^{[21] (P75)}在教材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海外学校受其提倡白话文的影响颇大，开始改用白话文的教科书。端蒙学校自1918年起增设华语科，其他科目仍以潮语教学，随着民族意识的日益高涨，尤其是在日本侵华以后，端蒙遂决定以华语取代潮语为教学媒介。^{[22] (P75)}据当时国民党政府针对英属马来半岛侨校的调查显示，到了1930年代，其课程除党义及英文外，其余科目均照“中小学暂行标准”办理。^{[22] (P522)}日本学者合田美穗也指出，端蒙学校在1930年代所使用的教科书是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在1927年出版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版本，其内容就涉及国民党旗、孙中山、纪念中华民国、支持中国货及中国国耻等等爱国的内容。^{[8] (P6)}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在在表现了灌输爱国（中国）主义、民族情感的价值观。1935年陈育崧等为新加坡南

① 1919年4月，中国教育总长黄炎培曾到校演说。参阅林国璋《本校大事记》，见王韶生主编《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3。但查历任中央教育长官官职表，1919年的教育总长一职应是由傅岳棠和袁希涛先后出任，虽黄氏曾在1921年及1922年有两次担任总长的机会，但他并未就职。参阅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页1500。据载，黄氏的确曾先后几次到过新加坡。参阅王华斌、王燕子著《黄炎培》（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页86。

② 《校闻》，见《端蒙校刊》第六辑第六期（新加坡：端蒙学校，1937），页86；林国璋《本校大事记》，见王韶生主编《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页4—7。

洋书局编印华文学校教科书,其中虽然增加了一些适应当地的内容,但编写的内容思想仍以中国国内的教科书为依据。〔23〕(P144)即使到了1956年,学校在制订教学课程时,虽然开始加入了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标准,但基本上仍依照“祖国”颁布之标准。〔24〕(P130)还有,虽然端蒙创建于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但从创校开始,其行政档案、来往信函,在1916年之前皆用清朝的年号,1917年以后则用中华民国的年号,尽管学校为了方便学生,从1927年起凡有关考试事宜采用阳历,但学校在其他行政方面仍然采用民国的年号,直至1933年。端蒙学校这个行政措施,从侧面反映了新加坡的潮州社团学校,一直到1930年代以后,多数仍以华侨学校自居,还未步入本土化的历程。〔8〕(P4)

纵观这个时期的教育性质,明显的是属于侨民教育,也即是说,当时的潮人学校着重培养华侨的中国国民意识。在来自中国的各派系人员大力宣扬侨教和提倡兴学之下,潮人社群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增涨也在无形中形成,从而启开了当地华文教育的另一风貌。它们都在表现了战前潮人办学的立场,说明了学校的设置与发展是与中国脱不了关系的。总括来说,这段时期潮人学校的种种发展与变化,可说是它们与中国政治环境以至教育制度的变化所发生的互动效应。

三 融入本地教育体系:战后潮人学校的公立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也作了一系列适应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对潮属社团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冲击,引致潮人学校出现再次的重大转型。首先,战后初期至自治前(1945—1955年)英人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地统治期间,殖民地政府虽然继承战前的教育政策,让各源流教育继续各自为政,但对华校的控制也在一步步加强。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激起了新、马华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更进一步的高涨,而影响更深的还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那些受华文教育的青年学生,更是受到极大的鼓舞。接着,国、共两派人马积极拉拢这些华人,促成本地华人分成两派,许多华校更成为不同政治派别争夺的阵地。华校生就在这一微妙的情结纠葛中,引发20世纪50年代一连串的学潮事件。在这种不利于殖民地统治的发展形势下,英殖民地政府颁布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包括《学校注册法令》、《十年教育计划》、《五年教育补充计划》、《两种语文教育政策白皮书》等。〔25〕(P84—85)这些新法令和计划的推行,目的都是要对华校严加管制。1952年,由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临时组织的华文教育委员会公布的课程纲目,不但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也强调两种语言政策,以同化方言教育。当时的许多潮人学校,如端蒙学校,也多改用内容比较本土化的教材。〔26〕(P266—267; P276)1955年,义安公司扩大端蒙学校的规模,增设分校,改用新校歌,把旧校歌里“勉哉我少年英雄,中国主人翁”的字句删掉①,并明确说明其属下三校的宗旨是普及教育,发扬中华文化,培养优秀公民;而收生则不分畛域,凡愿遵守校规,有志向学之子女均得报名入学,所采用的课程以适应该地情形为标准。〔27〕(P139—140)1957年,在政府所颁布的《新教育法令》和《1957年津贴条例》之下,潮人学校得到了政府的全面津贴,成为《政府辅助学校》,在性质上已属公立,潮人社团对其教育事业自此失去往日的主导权。义安公司虽然也赞助学校发展经费,但大部分的校务行政权,包括教职员的聘任,收生的标准,学生的编配,课程的拟划和教科书的设计等,都转移至教育部;在教学上则强调本土化,以淡化对中国的意识情结,着重培养华人对新加坡的认同和效忠。〔28〕(P37)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潮人学校经历了另一个转折。这时,越来越多的华人,或在当地长期定居,或在当地出世,已将自己视为新加坡国民,而通过教育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建立一个新兴国家,遂成为政府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着重任何单一种族或语言的学校对多元种族国家意识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存有其政治的敏感性,而政府对1950年代华校生因对中国的情结所导致的政治问题,仍然引以为戒。在经济方面,政府推行工业化,须和西方经济体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在这种政治和经济考量之下,再加上历史的渊源,政府虽然宣布以华、英、巫、淡米尔语为四种官方语言,但英文却成为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备受重视和广泛使用的行政语言,也是国家法令规章条例的标准语。政府对学校的改革,尤其是对各帮所办的学校,也无不表现了这样的前提。最为明显的是教育政策以英文教育为主,推行英文教学。在英文成为主流语言的趋势下,家长为了子女前途着想而不得不将子女送到英校就读,以致造成华校学生来源的逐年锐减(参阅表5)。又因为在市区重建计划之下,许多住在学校附近的居民纷纷迁移至新的组屋住宅区,这也使许多华校的生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而面临停办的厄运。1959年,华校占全国学校总数的43.6%,1985年降至3%,而英校则从1959年的50.9%增至1985年97%。华人社团曾经针对这个重大的冲击努力地做出对应,但仍无法阻止社会的现实需求。〔29〕(P161)至于端蒙学校,

① 端蒙学校之新旧校歌可参照《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与《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

自1969年起，为响应政府的两种语言教育政策，也在各年级积极进行英语教学，采用英语课本，它作为华校的传统其实已名存实亡。^{[8] (P10)}1980年，教育部分派四班英文源流的中一学生到该校上课，于是端蒙遂由传统的纯华校，变为兼收华英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至1987年，新加坡所有教育源流的学校被纳入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英文成为教学媒介，母语变为第二语言，不再有语文源流之分。至此，新加坡华文学校，不复存在，而变成公立化的混合学校。潮人社团所主办的学校也和其他华校的命运相似，它们都随着国家的独立而完成同样转型历程。

表4 新加坡华英校学生人数比较表（1948—1983）^{[3] (P274; 226)}

年份	英校生	华校生	年份	英校生	华校生
1948	33,322	58,096	1966	212,009	122,409
1949	37,655	64,434	1967	219,769	119,664
1950	49,690	72,951	1968	225,401	118,356
1951	55,292	75,975	1969	224,929	116,699
1952	63,386	74,104	1970	277,239	115,349
1953	71,118	79,272	1971	227,190	113,711
1954	84,418	81,605	1972	229,386	112,509
1955	97,057	94,244	1973	229,492	106,387
1956	112,575	108,490	1974	232,834	98,823
1957	127,761	117,374	1975	234,251	89,823
1958	145,362	129,155	1976	234,700	78,712
1959	163,486	140,231	1977	234,994	68,315
1960	180,275	147,448	1978	241,469	57,455
1961	191,651	152,829	1979	284,507	48,283
1962	200,062	154,384	1980	252,398	46,078
1963	209,070	156,302	1981	251,254	39,968
1964	208,147	155,131	1982	355,921	32,855
1965	202,049	125,368	1983	273,085	17,550

四 适从大局，重新定位：潮人教育事业的积极精神

值得探讨的是，随着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潮人社团如何准确地拿捏本身的办学方针及兼顾政府的新教育政策准则？潮人固有的文化教育观又将如何配合国家政策的发展？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两全之策？这是对潮人社团的艰巨挑战。潮人领袖连瀛洲便曾明确指出：

民间团体亟应改变其以往之宗旨，以适应现社会之需求，配合国家之发展，促使会务活动趋向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社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而会馆方面，对内必须保持固有之伦理传统，恪守常规，对外更应扩大视野，远瞩前途。凡对公益、慈善、文化、技术等方面，皆应集思广益，共谋发扬，如此，国家得以兴盛，社会得以繁荣，个人得以康乐，而会馆之传统组织自能永垂不朽矣。^{[3] (P5)}

从连氏的言论中可看出，他有意识地领导潮人社群去适应新加坡政治环境的转变。他力求在文化教育的层面上“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精神”去适从大局势。郑赤琰一项有关潮人政治适应能力的研究显示，他们不但适当跟随政治变迁而作出相当大的转变，而且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的地位，都是愈变愈好。^{[32] (P733—751)}诚然，在面对政府教育政策的重大转变，潮人社团适时地调整其本身的态度，改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支持教育事业。除了端蒙中小学外，义安学院

的改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战后设立的义安学院见证了国家的蜕变期,学院本身也在这时期为本身找寻适当的定位。^[33] (P22) 学院最初办学的方针之一是为了争取华文为教学媒介,但它同时也适应当时建国的情境,为建立多元种族的国家认同而鼓励华人学外族语文,所以它开设了巫文系^[34] (P3),这足以说明它作为一所潮人的教育学府,亦同时为配合国家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积极的反应。学院在开办初期,原以发展文理商四年制的大学学位课程为蓝本,但后来接受政府的意见,由原有文化教育性的教学方针改为科技教育。同时为了应付工商业的需要,教学媒介和教材也改以英文为主。这些皆显示了学院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工业,适应社会之需求,更改学制以培养一批国家所需的专业科技人才。但从另一角度去观察,这又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院受到政府不可抗拒的决策干预而改变其原先的教学方针?无论如何,在几次的改组过程中,潮人社群都深深体会到,为了寻觅生存之道,必须以适应当下政治环境为原则,充分表现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潮人社团的这种反映,当然深受政府的欢迎,而当年义安学院也获得政府当局的大力支持与重视。^① 1968年改制以后的义安学院,改为公立学校,校务归教育部,义安公司的董事部在名誉上虽然保持某些权力,并在学院的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已失去对学院的主导权,但学院永远保有“义安”之名,仍获得义安公司的资助。学院现已易名为义安理工学院,并在金文泰路(Clementi Road)建立新校园,占地60英亩,由义安公司捐献。目前义安公司每年仍拨出巨款资助学院的经费,并提供奖、助学金给学生。另一所由义安公司创办的义安女校,1956年后接受政府津贴,1967年起开始兼收男生。在面对迁校时,由于获得义安公司的继续赞助,保留了“义安”这个名称,改为义安小学,并于1982年迁入位于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的新校舍。该校舍的建筑费近1000千万元,其中500万元由义安公司负责,其余由政府资助。义安公司也在端蒙中学关闭后,出资建立义安中学。^② 这是潮人社团为了适应国家的政策对教育事业所改变的另一种资助方式。就是在这样的适应性架构之下,潮人社团力求为自己所创办的学校寻找继续生存的途径。它们也设立奖、助学金,一如既往地资助会员子女求学深造,为国家培养人才作出贡献,从1980年代开始,它们更积极地通过举办各种文教活动,以弘扬华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上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潮人从中国潮州飘洋过海,流落到新加坡谋生和寓居,至19世纪中叶,随着潮人社群的逐渐壮大,新加坡的潮人社团开始出现,并在它们的积极主导下,创办了许多自己的学校。一个世纪以来,潮人社团和侨领先贤们胼手胝足,出钱出力,延师兴学,教育子弟,不仅为潮人社群造就了不少人才,也提高了人民的知识水平和促进了华人社会以至国家的进步,不仅使潮人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也为新加坡的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无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抑或是在新加坡独立自主以后,新加坡的潮人社团皆以推动传统民间文化和社区活动为动力和纽带,整合和凝聚潮人社群,承担了当地的许多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华文教育和科技教育方面最为突出。这些成就,除了有赖于潮人侨领的倡导外,会馆的成员和潮人社群的支持响应与积极参与,也是办校活动能取得持久成效的基本因素。正如刘宏在谈及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时所指出的,这些办校活动的动机“除了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教育的重视之外,也是他们团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直接体现。”^[35]

随着中国和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潮人社团兴办的学校在性质上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型。无论是从最初的潮人学校转型到华侨学校,或是从华侨学校转型到华人学校,以至最终转型成为政府辅助的公立学校,融入国家教育体系,这些变革都明显展现了潮人社团的教育事业与中国、新加坡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从侧面反映了它们并非一成不变,僵硬地维护自身社群的文化教育,而是在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时,以一种积极态度自我调适,并在新的教育体系里为自己找到新的定位,以新的方式继续在中华文化和传统教育的传承上扮演一定的功能,避免了被社会淘汰的下场。另一方面,潮人学校的这种转型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说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本土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新加坡华人社团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时局和在国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定位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M].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① 从当年学院的开幕典礼上嘉宾云集,总理李光耀、教育部次杨玉麟及政务次李炯才等各政府部门长官都出席典礼,盛况空前,其获政府的支持程度之深可想而知。参见刘英舜《1963之义安学院》,见《义安学院周年纪念刊》,页1。

② 端蒙中学则由于在面临关闭转址时得不到义安公司的继续支持而不得不在1995停办。关于端蒙中学的关闭,义安公司的解释是公司曾向教育部官员要求在市郊拔地供建新校舍。教育部表示依照政府规定,必须将端蒙中学原有校舍(即潮州大厦)与政府进行交换。因为潮州大厦是潮人之重要建筑物与象征,义安公司及潮州八邑会馆,均在此设办公室,所以对教育部所定之条件,难以接受。于是向政府要求在市郊外拔地,另建一所“义安”为名的中学。参见《献词——张泗川先生》、《献词——林继民先生》, *Windows on Ngee Ann Secondary, 1994 — Our First Year Singapore Ngee Ann Secondary School, 1994*, pp. 10-11.

- [2] 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M],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唐青. 新加坡华文教育 [M]. 台北: 华侨教育出版社, 1964.
- [4] 许 吾. 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 [M] 新加坡: 南洋书局, 1950; 靳浩. 潮人学校 [A],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六十周年纪念 [C], 1989.
- [5] Francis Ng How Jiah, *The Teochews in Singapore: A Study in Social Geography*, [M] Academic Exercis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2.
- [6] 潘醒农. 马来亚潮侨通鉴 [M] 新加坡: 南岛出版社, 1950; 潮侨溯源集 [M]. 新加坡: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1993.
- [7] 潘醒农. 马来亚潮侨通鉴 [M], 新加坡: 南岛出版社, 1950; 许 吾. 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 [M]. 新加坡: 南洋书局, 1950.
- [8] [日] 合田美穗. 从新加坡潮州社团的教育事业看华人认同感的转变: 以端蒙学校为例 [A]. 香港: 第四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C], 2001.
- [9] 南洋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华人史调查小组. 巴爷里 葱茅园村史 [M].
- [10] 李谷僧. 新加坡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 [M], 1956.
- [11] 谢美华. 华侨教育与 20 世纪初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产生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7 (1), 26.
- [12]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第 1 册)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 [13] 郑良树. 新马战前的华文教育 [A].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 [C]. 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86.
- [14] 郑良树. 保皇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 [A], 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台北: 国史馆, 1997.
- [15] 林国璋. 本校大事记 [A]. 王韶生. 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C], 1931; 王华斌、王燕子. 黄炎培 [M] 河北: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 [16] 姚梦桐. 义安女校发轫史 [A],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六十周年纪念 [C].
- [17] 1931 年端蒙总校训育报告 [A], 王韶生. 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 [C].
- [18] 杨进步. 战前新华社会结构领导层初探 [M]. 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77.
- [19] 新加坡 [N] 南洋商报, 1940—4—5 (7); 新加坡 [N] 星洲日报, 1941—5—30 (9); 姚梦桐. 义安女校发轫史 [A],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六十周年纪念 [C].
- [20] 朱寿朋. 光绪东华录: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A], 饶宗颐. 新加坡古事记 [C].
- [21] 杨伟群. 校史 [A]. 黄今英. 端蒙中学七十周年纪念刊 1906—1976 [C]. 1976.
- [22] 教育部.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M] 上海: 开明书店, 1934.
- [23] 梁英明.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1.
- [24] 校务概况 [A], 李谷僧. 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 [C]. 1956.
- [25] 周聿峨. 东南亚华文教育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 [26] 崔贵强. 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 [M]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994.
- [27] 王韶生. 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 [M].
- [28] Andrew Ng Lian Timn, *Education And Ethnic Problems in Singapore 1959—1969* [M]. Diploma of Advanced Study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Keele, 1971.
- [29] 薛君度. 曹云华.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 [30] 孙一尘. 战后新加坡的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关系 1945—1983 [A],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博士论文 [C], 1987.
- [31] 新加坡潮阳会馆金禧特刊 [M]. 新加坡: 新加坡潮阳会馆, 1976.
- [32] 郑赤琰. 从潮州会馆的演变看潮州人的政治适应力 [A]. 郑良树.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下册) [C].
- [33] Lim Kok Hua, *The Ngee Ann Story: The First 25 Years 1963—1988*, [M].
- [34] 刘英舜. 1963 年之义安学院 [A], 义安学院周年纪念刊 [C], 1964.
- [35] 刘宏. 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2 (1).

(责任编辑: 翁奕波)

possible ways legal transplanting and the native resource. The confidence in constituting the modern law and the ability whether the law can mo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ety are the fatal differences concealed behind the contest of the two ways. Restricted by its own conditions, China can only develop the rule of law by legal transplanting, but China should also give attention to the rule of moral.

Key words: law; rural; area; rationalism; constitution; moral

Reexamination on the Conception of Objective of a Crime

XIANG Chao-yang, LI Jing

(Law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of a crime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among criminal jurists its position in criminal law system is not definite. Some scholars suggests disputative and unsystematic views on the subject. In the paper, authors discussed different views and then try to provide a repositioning of objective of crime in the requisites in constitution of crime.

Key Words: objective of crime; object of act; real bearer of criminal object; legal interest i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Enterprise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 Study of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Schools Established by

Teochew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Lee Chee Hia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The Singapore colonial government before the 2nd World War had always neglected Chinese education. Established as early as in 1845, the Teochew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played the main roles of not just helping the newcomers to settle down, acting as intermediaries in intra-community conflicts, but also running classes and schools for membe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enterprises of the Teochew associations and discusses their proactive roles in the last century under the profound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Key words: Singapore; Teochew associations; education; politics; interaction

Notes to Some Words in Thai Borrowed from Chaozhou Dialect

(Thai) LI Tai-s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When Chaozhou people emigrated to Thailand, they also brought their dialect there and influenced 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ai, many words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chaozhou dialect, and for some different reasons,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some borrowed words have been changed. The author gives an brief analysis to the phenomenon of transferred words.

Key Words: Thai; borrowed words; chaozhou dialect

Financial Guild of Business Port and the Power of Control of Local Currency

Take Shantou in the Qidui paper note period as a case

CHEN Jing-xi

(Liberal Arts College,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In the business port and treaty city of Shantou of the Qidui paper note period, the financial guild, which is organized by the local businessmen that issued Qidui paper note, is in control of the local monetary by establishment and running of a series of guild institutions, making the credit of Qidui paper note higher than the money issued by government banks, Shangxi Banks and foreign banks.

Key words: Shantou; Qidui paper note; financial guild; treaty port; power of control of money

A Positivistic Observation on the Problems of Shantou Economic Development

LI Xiang

(Training School of Shantou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Shantou's competence among China's cities has been lowered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current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still show no satisfactory prospects. On the basis of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y, the author suggests, in order to construct Shantou into an economically strong city, some main problem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development mode,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should first be resolved in consideration of loc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social-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o be optimized in the spirit of openness.

Key words: Shantou;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 problems